

洙泗学人文库

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

杨朝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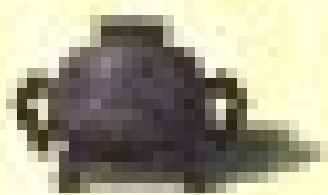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中國人生活

第一輯

中國人生活



第一輯



洙泗学人文库

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

杨朝明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杨朝明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3

ISBN 7-5333-1109-4

I. 儒… II. 杨… III. 儒家—文献—研究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3648 号

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

杨朝明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日照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 插页 229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33-1109-4

B·136 定价: 21.00 元

总 序

宋焕新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是世所公认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与时俱进，绵延发展两千多年，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远播海外，构成东亚文明的内核，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所提倡的“有教无类”、“仁者爱人”、“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已经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发掘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吸收与融合，是传承中华文明，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的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学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曲阜师范大学设学于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一向以研究孔子儒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为己任。建校近五十年来，孔子、儒学研究从未间断，在科学研究、学科梯队、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是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的挂靠单位，孔子文化学院是国内高校最

早建立的孔子儒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先后承担并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级重点课题，出版了一批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学院办有《儒学研究动态》，定期出版《孔子·儒学研究文丛》，多次举办孔子、儒学研究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重视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2000年5月，依托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和孔子文化学院，学校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及海外投资者联合创办了中外合作孔子文化大学，孔子、儒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曲阜师范大学的孔子、儒学研究，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国际友人的大力帮助。世界艺术文化振兴协会会长、日本友人深见东州先生捐资设立的“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对于促进以孔子文化大学（曲阜师范大学）为中心的孔子儒学研究，弘扬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国际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读者面前这部《洙泗学人文库》，就是由“深见东州儒学研究基金”资助出版的。《文库》共有十本，每本20余万字，是曲阜师范大学长期从事孔子、儒学研究的专职教授和兼职教授从已发表的文章中选编而成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儒学研究也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入的。我们期待学者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孔子、儒学研究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作者系孔子文化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
曲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

前 言

儒学研究应当以文献为基础，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现在的儒学研究存在着对文献利用不够或者认识不足的严重缺陷，也是毋庸讳言的。

笔者认为，早期儒学（或称为“原始儒学”）也像中国古代文明那样，存在着一个“需要重新估价”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大批地下儒家以及相关学术文献本身的问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又“激活”了大量的传世文献。而这些传世文献都经过学者们的“严谨”甄别与考证，却多被打入“不可靠”的队列之中。现在看来，原来的怀疑都在不同程度上“走过了头”，因而，在许多层面对早期儒学的认识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以笔者的浅见，儒学的不少关键问题都需要重新认真考虑，而这些问题又无一不与儒学典籍的重新认识密切相连：

首先，关于儒学的渊源问题。儒学的形成当然有一个既远且广的文化背景，有其特定的时空环境。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孔子及儒家心目中的圣人，对儒学的形成一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古代圣王的事迹见载于《尚书》、《逸周书》等典籍，这些材料如何对待，有进一步认真研究的必要。笔者撰写的《〈尚书·皋陶

谏》与儒学渊源问题》、《周训：儒家人性学说的重要来源——从〈逸周书·度训〉等篇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逸周书〉有关周公诸篇刍议》是这方面探索的一种尝试。

第二，关于孔子的研究资料。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由于学术研究出现的偏差，特别是疑古思潮的影响，不少人研究孔子仅仅依靠《论语》一书，除此之外，似乎任何资料都不可靠；更有甚者，《论语》中的个别篇章也遭到怀疑，有人认为是其他学派的东西窜入进来。这样，孔子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就失去了依托，好像他只留下了《论语》中的片言只语。

全面研究孔子的思想，全面研究孔子的学术贡献，决不能不考虑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孔子曾经认真整理古代文献，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作《春秋》，古籍中的相关记载言之凿凿，不容人不信。收入本书的不少文章中，笔者都谈到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如《〈尚书·皋陶谟〉与儒学渊源问题》、《上海博物馆竹书〈诗论〉与孔子删诗问题》、《新出简帛与早期儒学的重新认识》等。

另一方面，孔子长期从事教育，他有不少珍贵的思想材料被后学弟子记录并流传下来，如保存在《孔子家语》、《孔丛子》中的有关材料即是。但它们却长期遭受怀疑，几乎被弃置不用，至为可惜！在本书中，《〈孔子家语·执轡〉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孔丛子·刑论〉与〈孔丛子〉的成书》、《〈礼记·孔子闲居〉与〈孔子家语〉》等篇都谈到了对这些材料的认识。

第三，孔子以后的学术传承。孔子创立了儒学，我们以前都认为孟子、荀子是孔子以后的大儒，但孔孟之间的学术怎样

连接，以前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人们的认识比较模糊。现在，赖地下材料的不断问世和学术的迅速发展，我们已经可以对儒学的早期传承给予大致的描述了。本书中的《〈孔子家语·颜回〉篇与“颜氏之儒”》、《郭店楚简与子思学术研究》等篇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初步看法。

第四，儒家经书的研究。本书收录的文章中，研究《诗经》、《尚书》者占了较大比例。“六经”之中，《诗经》、《尚书》号为难读，两千多年来，有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研究者多，存在的问题也有不少。例如，今文《尚书》各篇周诰的顺序问题，某些篇章（如《金縢》）是否完整可靠，具体篇章（如《酒诰》、《洛诰》、《费誓》）的内容和价值；《诗经》的编订，某些诗篇（如《伐檀》、《齐风》三诗《南山》、《敝笱》、《载驱》）的主旨，《诗经》的早期应用与传流，出土文献对《诗经》研究的意义等，对这些问题，本书中的一些文章都有涉及。

除了《诗经》和《尚书》，除了文章中直接研究的《逸周书》、《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郭店楚简、上博楚竹书，本书对其他若干相关的儒家典籍也有涉及。如在《新出简帛与早期儒学的重新认识》、《〈孔子家语·执轡〉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等文中，笔者都谈到了对《周礼》成书问题的初步看法，这个意见是否正确，以后还要深入研究。

第五，新出儒家文献的研究。最近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地下材料的面世，不断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尤其近年整理问世的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楚竹书，对学术界更是巨大震动。与其他出土材料相比，这些文献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早在战国时期，二是都属于以儒家为主的学术

文献，三是数量庞大。惟其如此，它们才引来了学人们的极大关注。这些材料还没有全部与学人见面，但大家都已经惊叹其对中国早期学术史研究的意义。从事中国儒学史研究，不能不对这些文献抱有极大的热情。因此，虽然自己学力不够，但仍然十分关心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并积极学习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

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大部分是近年撰写而成，除了少数几篇读书札记，都在不同的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笔者主持承担了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项目——“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拟主要利用地下新出文献资料，对早期儒学进行系统研究，将地下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反思前人研究得失，总结既有研究成果，力争对儒家的思想渊源、形成、内容、学派、典籍等方面做出新的实事求是的论断。本书即属于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过研究文献进而研究早期儒学，笔者的努力才刚刚起步。尽管如此，笔者已深深感到做好基础研究对于儒家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有不少前人论述过义理之学与实证之学的关系，如钱大昕就说“有训诂然后有义理”，徐复观先生则专门谈到过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他指出的一些问题到现在仍值得注意。将新出儒学材料进行初步梳理，再反观以前的早期儒学史研究，不难发现，徐复观先生所谈的现象确实仍不一而足，不少珍贵的材料被“武断地加以剔除”，“思想发展之绪”被“颠倒”者又“何可胜数”。难道这类的儒学史还不需要重写？

笔者所在的曲阜师范大学专门史（思想史）学科是山东省高校的重点学科，本学科以研究孔子、儒家的学术思想为主，

在“十五”规划论证中，学科的学术委员李学勤、朱凤瀚、晁福林、丁冠之、王晓毅、王钧林、郭沂、江林昌等先生以及学科的校内专家都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在结合儒家典籍进行儒学研究方面，李学勤、朱凤瀚二位先生更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如李先生希望我们加强孔子及七十子资料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以前我的师辈们辑录出版过《孔子资料汇编》、《孔子弟子资料汇编》等，为这样的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时下大量儒家出土文献问世，早期儒学研究形成热潮的时候，深入进行这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更为重要。朱先生指示我们注重礼学研究，注重《周礼》、《仪礼》、《礼记》的研究，注重《周礼》与齐鲁文化、《礼记》与早期儒学的研究。这正是研究薄弱又亟待加强的课题。这些宝贵的意见，对我们学科的发展十分有益，对我个人的研究也十分有益，我衷心感谢先生们的指教！

杨朝明

2002年3月18日

目 录

总序	宋焕新 1
前言	1
《尚书·皋陶谟》与儒学渊源问题	1
《周诰》诸篇次序考订	17
也说《金縢》	40
《康诰》乃“周公以成王之命”而作	58
“鲁酒薄”与周公《酒诰》	64
《洛诰》研究	69
《费誓》时地管见	89
周训：儒家人性学说的重要来源	
——从《逸周书·度训》等篇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	97
《逸周书》有关周公诸篇刍议	119
鲁国与《诗经》	136
《伐檀》诗旨未必刺贪	156
《齐风》三诗《南山》《敝笱》《载驱》诗旨新说	161
从《诗经·閟宫》看鲁国前期历史	180
新出简帛与早期儒学的重新认识	191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	220

郭店楚简与子思学术研究	230
上海博物馆竹书《诗论》与孔子删诗问题	237
上海博物馆竹书《鲁邦大旱》管见	245
《礼记·孔子闲居》与《孔子家语》	262
《孔子家语·执轡》篇与孔子的治国思想	274
《孔子家语·颜回》篇与“颜氏之儒”	295
《孔丛子》“孔子论诗”与上博《诗论》	306
《孔丛子·刑论》与《孔丛子》的成书	319

《尚书·皋陶谟》与儒学渊源问题

《皋陶谟》是《尚书·虞夏书》中的一篇，根据传统的解释，晚出的《孔传》将《皋陶谟》一分为二，从中析出《益稷》，其实未必。但不论如何，《皋陶谟》虽然记录帝舜与大臣讨论政务的话，而它确实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记皋陶与大禹论其慎身、知人、安民之谋，后记大禹与帝舜论其注重民生、君臣之道以及对待苗民之计等。《皋陶谟》篇首有“曰若稽古”四字，意思是审查或者考究古代事迹，由此证明该篇属于后人的追记。但它是根据当时流传下来的资料写成，成篇也不会如现代一些学者所说太晚^①，它其实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皋陶谟》全篇字数不及两千，但其中内涵之丰富，意义之精微，足以引起今人重视。皋陶、大禹处在尧舜时代，二人共辅舜政，是大舜最为得力的两位助手，所以孟子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②在《皋陶谟》中，舜与大禹、皋陶的讨论谈话，涉及到修身养德、顺天应人等许多治国安民的根本道理，人们解读《皋陶谟》，很自然发现该篇与儒家主张之间的联系，并将皋陶的思想看做儒学的源头。^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继续研读《皋陶谟》，分析该篇所蕴含的学术信息，认为它与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之间有关系，或者说它对孔子思想产生的影响的确不可

低估。

(一)

孔子以前,《诗》《书》《礼》《乐》等已经颇受社会重视,到了孔子时代,《诗》《书》《礼》《乐》有所散乱,于是,孔子对其进行整理加工,并以之教授生徒,使其影响越来越大。孔子重视《尚书》,也看重其中的《皋陶谟》,从孔子对《尚书》的编订以及他对该篇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该篇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尚书》中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具有教化的功能。关于这一点,春秋前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晋人的话说:

臣亟闻其言也,说《礼》《乐》而敦《诗》《书》。
《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

由此可知,早在孔子以前,《尚书》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人们重视该书,发掘其中的义蕴,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上述《左传》中所引《夏书》之言,见于《尧典》和《皋陶谟》,在《皋陶谟》中作大禹的话。

到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在这样的情势下,《尚书》也出现了一定的缺失。《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五帝本纪》也说“《书》缺有间”;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的《要》篇中有“《诗》《书》《礼》《乐》,不□百篇,难以致

之”之语，这说明《诗》《书》《礼》《乐》都是有文成篇的。^④但该篇又记述孔子的话，说“《尚书》多於也，《周易》未失也”，李学勤先生推测“於”字原为“阙”，后讹而省作“於”。“阙”与下句的“失”，正好互相呼应。^⑤孔子正是在《尚书》出现缺失的情况下对该书进行整理的。

孔子整理《尚书》，也是因为其中蕴涵着理解圣王政治、认识社会人生的义理。孔子对《尚书》的作用看得很清楚，他说：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书》之失诬……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⑥

在这里，他是把《尚书》与《诗》、《乐》、《易》、《礼》、《春秋》一起进行议论的。孔子认为，“疏通知远”的《书》教就像“温柔敦厚”的《诗》教、“广博易良”的《易》教、“恭俭庄敬”的《礼》教等一样，对邦国教化、对人的举止行为起到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知识广博，通达于政事，了解历史，远知古代帝王，是得力于《书》的教化。如果不善于学《书》，就有可能知识失实。疏通博洽而不失实，就是真的深通《书》教了。

既然《书》可以疏通，可以知远，那么，对于缺失的《尚书》就有整理“论次”的必要。《荀子》说书为“政事之纪”，那么，孔子以前当有许许多多的书篇。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世家》所说的“《诗》《书》缺”及《五帝本纪》所说的“《书》缺有间”，其中“缺”更多的应该是缺失、缺损、不完整的意思，而不一定有匮乏的意思。当时，《诗》《书》同样出现缺失，对于《诗》，孔子就进行了整理，《论语·子罕》记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根据《史

记·孔子世家》和《汉书·礼乐志》的相关记述，孔子所“正”主要是正其篇章。另外，孔子时候，诗篇很多，他还作了删诗的工作。^⑦“《诗》《书》缺”的“缺”应没有匮乏之意。

对于《书》，孔子可能主要是筛选和断限。《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五帝本纪》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尧以前的材料，证据不足，难以取用，所以上限自尧开始。看来，刘歆《七略》所言是对的：“《书》之所起远矣，孔子纂焉，上断自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⑧

孔子编订《尚书》以尧为起点，是因为孔子崇尚先王之道，崇尚古代圣王，《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孔子编订的《尚书》中，就有这样的体现。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是圣王明君，据《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孔子又对古圣王的礼乐文明制度倍加赞赏，据《论语·泰伯》，孔子赞尧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又极力称赞舜时的《韶》乐，《论语·八佾》记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更称颂舜能选贤任能以至无为而治。《论语·颜渊》曰：“舜有天下，选于众。”《泰伯》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卫灵公》记：“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皋陶谟》中记帝舜的话说：“臣作朕股肱耳目。”他重视臣下的作用，在《皋陶谟》